

不屈的共产党人

2

不屈的共产党人

(二)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倪天煦

不屈的共产党人

BUQUDE GONGCHANDANGREN

(二)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京北新华印刷厂印装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25印张 241,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85,001—93,900

书号 3001·1765 定价 1.60元

浩 長
氣 存

刘少奇同志手书



高君宇(1896—1925年)



刘尔崧(1899—1927年)



卢德铭(1905—1927年)



周其鉴(1893—1928年)



周文雍(1905—1928年)



曾天宇(1895—192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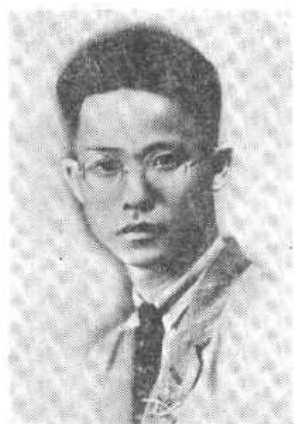
赵自造(1901—1928年)



杨 殷(1892—1929年)



旷继勋(1895—1933年)



阮啸仙(1897—1935年)



胡 海(1901—1935年)



左 权(1905—1942年)



王若飞(1896—1946年)



邓发(1906—1946年)



罗炳辉(1897—1946年)



关向应(1902—1946年)



罗世文(1904—1946年)

目 录

闪电般耀亮的一生.....	1
高君宇传略	
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而不懈战斗	26
刘尔崧传略	
湖南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52
卢德铭传略	
历尽艰险 威武不屈	63
周其鉴传略	
广州工人武装的杰出领导者	87
周文雍传略	
高举红旗 战斗不息	126
曾天宇传略	
为建立工农武装而战	145
赵自选传略	
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167
杨 殷传略	
英名彪炳史册	196
旷继勋传略	
“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	219
阮啸仙传略	

一颗丹心献人民	244
胡 海传略	
“愿拚热血卫吾华”	259
左 权传略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284
王若飞传略	
矢志献身为人民	309
邓 发传略	
从士兵到将军	326
罗炳辉传略	
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344
关向应传略	
“许党为民万事轻”	362
罗世文传略	

——闪电般耀亮的一生

高君字传略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字烈士生前自题在照片上的一首诗。他的一生，正象诗中所写的那样，是如闪电般耀亮的一生。

高君字，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字。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在“五四”前后新旧思想交替的动荡年代里，高君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帮助下，走上一条由

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他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我党的建设和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革命民主主义者

位于汾河岸边的峰岭底是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美丽的山村。然而，在黑暗的旧中国，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和全国受难的人民一样，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人民苦难的生活情景，在高君宇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但是，他当时无法理解阶级社会中的这些现象。当他到了懂事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朝政府和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但义和团余部仍在太原周围活动。义和团英勇抗敌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使他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他常和本村少年一起，手持木制的小刀、小长矛，口中喊着：“杀洋人，保中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当时正在静乐高等学堂读书的君宇，赞同辛亥革命，当剪辫子风气传到静乐县城的时候，君宇和同校读书的哥哥高俊德，首先剪了。当时有人惊恐地问他：“清朝皇帝回来怎么办？”他笑着反问：“要是革命党来了又怎么办？”在君宇的带动和说服下，许多人都剪掉了脑后的“猪尾巴”。

一九一二年，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来到太原读书，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他除了完成课业之外，还大量阅读进

步书刊，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常和进步青年们聚在一起，讨论国事。他的独到的见解，受到师友们的称赞。

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依然如故，建立在这种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机器，只是换了一块民国的招牌而已。原来对辛亥革命抱有幻想的高君宇，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年，晋西北遍遭大旱。君宇在假期返乡途中，目睹农村经济破产的惨景，逃荒的饥民、剥光皮的树举目皆是。回到故乡，幼年时一起玩耍的好友，或背井离乡，或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严酷的现实，打碎了他对辛亥革命所抱有的幻想，他怀着拯救同胞的愿望，向家中索取了大量银元和衣服、被褥，用驴驮着沿途分送给穷苦农民。但是，这只能资助几个难民，而广大的人民依然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又有什么用呢？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君宇在太原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条约的游行示威，并将《袁氏盗国记》等反袁书籍寄回家中，告诫父老兄弟，要关心国事。当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袁运动，这一运动在新思潮活跃的省立第一中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君宇以极大的愤慨参加了这一斗争。他发议论，写短文，还和进步青年一起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袁氏称帝失败，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分崩离析的局面，人民被推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中国

向何处去？成为广大爱国青年日夜思索的问题。就在这时，君宇中学毕业，他为继续寻求救国真理，毅然奔赴北京，考入了新思潮狂澜翻卷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中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从海外回国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使北大成为新思潮蓬勃发展的园地，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前线。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寻求救国真理的高君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课余，广泛阅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各种刊物，认真研究各种主义。其中，对他最有吸引力的是《新青年》，他热烈赞同《新青年》所提倡的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的主张。在《新青年》和其它进步刊物的影响下，他的反封建思想愈加成熟。

在北京期间，君宇目睹了上层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恣意横行，救国心情愈加迫切。但是，爱国有心，救国无术。中国向何处去？救国的道路在哪里？对于这个严峻的问题他依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答案。就在这徬徨苦闷之时，他于一九一八年秋结识了李大钊，并从李大钊那里，他第一次了解到十月革命，借到了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此时，以救国为己任的高君宇，仿佛在黑暗中摸行而突见一线阳光，心情十分激动。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

一九一八年五月，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中日军事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首先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发动游行示威，当留日学生遭到日本反动军警的殴

打追捕后，李达、黄日葵等留日学生，毅然回国，以示抗议。这一行动，立即得到北京爱国学生的同情和支持。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等人一起欢迎留日归国代表，并联络北京各校学生，于五月二十一日组织了两千余人的请愿游行。高君宇和请愿学生们一起，冲破军警阻挠，包围总统府，斥责反动政府的卖国行径。

这次请愿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使爱国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不久，高君宇和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等发起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后来，又经徐彦之、孟寿椿介绍，高君宇参加了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

同年十月，学生救国会的部分成员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并创办了《国民》杂志，君宇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当出版《国民》而无资金时，他带头捐款，筹划资金。在创办《国民》的同时，他还参加了新潮社，并为《新潮》杂志撰写白话文章，宣传新思想。他是新潮社最早的会员之一，在改选三届职员时，当选为干事部干事。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

一九一九年二月初，北京大专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被推选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

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失败的消息传来，如晴天霹雳，北京学生震惊了！高君宇和其他国民杂志社成员当天下午就在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行动部署。五月

一日李大钊在《五一杂感》一文中鲜明地提出“直接行动”的问题，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等深深感到只靠宣传、出版、教育等行动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斗争的需要，他们坚决赞同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他们奔走呼号，迅速将这一口号传播到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中去，联络各校学生准备采取“直接行动”。一场大的革命风暴在酝酿之中！

五月三日晚，高君宇又和其他学生会负责人一起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大游行，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通电全国各省“五·七”统一行动，高君宇是这次会议的骨干分子，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这天晚上，他和其他爱国青年一起，为第二天的游行示威规划路线，起草宣言，上下串连，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五四”当天，他奋勇当先带头参加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曹汝霖门前时，他和同学们冲入曹汝霖内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

“五四”之后，高君宇并没有被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所吓倒，他和李大钊为营救被捕同学日夜奔走。在被捕同学释放的那天，他们雇了汽车去迎接出狱的战友，并在北大二院操场参加了欢迎被捕同学大会。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

六月三日以后，我国工人阶级以其威武雄壮的气势登上政治舞台。先是上海随后遍及全国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正是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亲眼看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他十分兴奋，斗志更

加旺盛，连续上街讲演，控诉反动军阀镇压学生的罪行。当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近千名学生被捕，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刻，高君宇受北大全体同学的委托，毅然担任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领导学生运动继续前进。

为了宣传“五四”精神，进一步唤醒民众，同年十月，高君宇参加了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成为讲演团的主要骨干。每逢假日，他们打着旗帜，敲着铜锣到街头闹市讲演，进行反帝宣传。他负责组织了西城、南城模范讲演所的讲演活动，他先后以《私产制度与婚姻》、《人的生活》、《什么是自治》为题，发表了多次讲演。在讲演中，他曾几次遭到军警驱逐，但他毫不退缩，每次与军警据理力争，“台下掌声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一九二〇年三月在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第三次常会上，他被选为文牍干事。

五四运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活动并未停止，他们不甘心在“和会”上的失败，企图通过所谓中日直接谈判，对北洋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来取得山东的权利。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广大人民一起，积极开展了反对中日直接谈判的斗争。始终站在“五四”运动前列的高君宇参加了这一斗争。在这一斗争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北京学联被强迫解散后，高君宇不顾个人的安危，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撰写了《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义正词严地提出了反对直接交涉的理由，列举了直接交涉的“种种害处”。他强烈谴责北洋军阀政府不顾人民的舆论，替日本的“老头票”和“毛瑟枪”说话的直接交涉的主张，

批判了持这种主张的人。

在“五四”这场急风暴雨中，高君宇“奔走呼号，久而愈烈”，因积劳过度，曾两次咯血，但“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被誉之为“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的真理，并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向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少年中国学会里的左翼分子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前在北京成立的一个遍布数省、涉及海外留学生的一个学术性政治团体。它是当时各种社团中会员最多、影响最大、斗争最复杂、以至后来分化最明显的团体。高君宇从一九二〇年十月加入学会直至一九二五年学会解散，一直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特别是在几次关系到学会政治方向的斗争中，他作为会员中仅有的几个共产党员之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力排众议，发挥了战斗作用。

一九一八年六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次年七月正式成立。李大钊是这个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高君宇和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许德珩等都是学会的会员。由于参加学会的成员思想复杂，各种主义混杂，围绕学会的宗旨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的预备会，在北京召开，高君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针对王光祈等人不赞成将学会搞成政治团体的主张，尖锐地提出：